

范·弗拉森与后现代“趋向”之间的关联*

胡瑞娜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系,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该文从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视角,揭示了范·弗拉森哲学思想演变的特征,阐明了范·弗拉森作为反实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狂飙以及与科学实在论的论争中,其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所经历的巨大转向。从而说明系统地分析范·弗拉森哲学思想的演变对于把握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特征,并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上看待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范·弗拉森;经验适当性;后现代;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 B7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3)02-0040-06

20 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为先导的一系列哲学“转向”的实现和深入展开以及“后现代”运动的到来,反实在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所导致的极端性及其对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和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的推崇,使得哲学发展的道路危机重重,而“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的到来恰恰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为反实在论提供了一个启示性的视域;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也促进了反实在论的本质性转变。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较显著的特征和倾向之一,便是具有鲜明的反实在论的立场。因此,处于这一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范·弗拉森,其反实在论的哲学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构建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经验基础,后现代语言观以及后现代真理观。正是这些特征,体现了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哲学思想所独具的风格、意义和历史印迹。

一 范·弗拉森对后现代的“抉择”

之所以将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定位于后现代框架,是因为其抉择适应了 20 世纪哲学发展、反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的争论以及经验主义自身运动的内在要求。

首先,奎因的批判引发了科学哲学运动的后现代趋向。伴随着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刺激了科学哲学研究中一系列难题的生成。在这种情况下,自休谟以来传统的旧经验主义在对科学理论的解释方面,遇到了自身不可解决

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奎因深入系统地分析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两个主要理论基础的教条——两类知识的划分和“证实——还原”理论,极大地摇撼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根基。这种致命性的攻击在西方哲学界尤其是科学哲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长时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的方向,直接促成了传统逻辑经验主义在 60 年代以后的逐渐衰落,同时奎因基于这一批判的整体论的实用知识观也推动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走向具有批判精神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其次,历史主义的后现代特征形成了时代的潮流。继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之后,历史主义不断地兴旺起来。它通过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规范的科学哲学观念,否认存在独立于理论内容和科学共同体的绝对理论标准而主张极端的“非标准化”或“非理性化”的相对主义;通过对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论”的批判而倡导一种构建不要经验的科学知识大厦的相对主义;通过强调在经验意义上等价的理论之间不存在理论选择的途径而重视历史的因果相联;通过对传统的“对应”真理论或“一致性”真理论的批判而导致了真理论理论的构建及其形式体系的怀疑;通过引入自然主义的概念而把科学理论结构的改变和进化简单地还原为“社会-文化-技术”环境的整体转换。尽管历史主义的这些途径有其片面化、极端化特点,但是不可否认这些途径所导致的相对主义这一具有后现代趋向的特征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时代的潮流,而范·弗拉森的批判和论证恰恰符合了这一趋向,顺

* 本文受乔晓芙奖学金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收稿日期】 2002-09-25

【作者简介】 胡瑞娜(1974.12-),女,山西榆次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2000 级博士生,山西大学哲学系教师。

应了这一潮流。

最后，“双向批判”正是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手法。随着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不断深入以及世纪中叶“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整个科学哲学领域都在寻找各自的新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范·弗拉森作为一名反实在论阵营的著名代表，既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又不断地在批判科学实在论的过程中修正自己以求生存。正是通过这种“双向批判”，他汲取了历史主义的合理之处，并对科学实在论加以借鉴，以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为目的，以重挽经验主义的命运为使然，实现了自己朝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同时，他的构造经验论也恰恰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具有后现代趋向性的时代要求。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本论文将范·弗拉森的思想作为后现代反实在论的典范，合理分析和阐释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所经历的巨大转向，从而说明系统地分析范·弗拉森哲学思想的演变，对于把握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特征，并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上看待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甚至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二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经验基础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中，范·弗拉森作为一名杰出的反实在论者，以“双向批判”的手法，创造性地构建了以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为目的，以经验适当性为本质特征的反实在论的构造经验主义，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上，去重挽经验主义的命运，从而实现了自己朝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接纳实用主义，修正经验主义的纯粹性。在范·弗拉森看来，我们从来不会遇到一个无所不包，每个细节都完善的理论。即使是两个经验上等价的理论，接受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也会有很大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是按照经验适当性原则做出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接受一个经验上最小的理论时，并不是由于这个理论优于其它理论，而只是从实用角度选择的。显然范·弗拉森把实用主义的某些特点赋予了经验并形成了经验适当性的本质特征，试图克服经验主义纯粹认识论态度的弊端，适应了后现代哲学反传统和大融合的趋势，为科学哲学实现后现代转向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二) 超越并拯救现象，确立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范·弗拉森认为，“经验的适当性总是超越在任何给定时间人们所认识到的东西。”^[1]因此，当我们断定一个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同时也就是断定了我们相信理论关于这个世界中的可观察物和世界的描述是正确的，也就是理论拯救了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要发现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可观察部分的界限，我们就必须探究理论本身。在这里，没有超越，就没有拯救，也就无法确立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形成构造经验论的内在本质。显然，范·弗拉森力图在经验基底上，以其适当性来“拯救现象”，奠定了理论与世界的一种新型关系。

(三) 引入整体论观念，确立经验的整体结构性。范·弗

拉森将经验适当性看作是一个理论的整体特性，因而人们必须在没有任何经验迂回的情况下去定义经验的适当性，即所有的观察现象都适合于一个特定理论模型的经验的亚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理论的描述“大于”在观察基础上所决定的附属的特定部分，同时科学的假设必然也要超越经验证据，使它获得整体的理论意义。可见，经验是一个整体结构，它具有语义的整体性；经验适当性功能正在于它调整了理论的整体意义系统与可观察部分的特性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本质上，经验适当性是一种科学理论与测量现象之间的认识论的整体关联，离开了这种关联，也就失去了经验的适当性。

(四) 消解绝对性，突出经验适当性的相对性。在范·弗拉森看来，“断定经验适当性比断定真理弱得多，而且接受理论的这种束缚把我们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2]可见，经验适当性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相对性，它以适当性代替了真理的绝对性，以一种“弱”的立场避免甚至消解认识论中真理的确定性，从而站在反实在论立场上以经验为基底在价值观上捍卫经验主义，摆脱困境，消解哲学难题。

总之，范·弗拉森沿着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趋向，接纳实用主义，引入整体论和相对性观念，超越现象并拯救现象，使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结构相嵌性成为一种真正的、有创造性的经验的建构，从而最终在适当的经验基底上构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后现代反实在论。

三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

20世纪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展开以及解释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的广泛深入，使得整个哲学尤其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由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了方法论，同时也促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始于20世纪中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特征正是一种本质的方法论性的演变。范·弗拉森作为当代反实在论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后现代方法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语言学方法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将语言学方法渗透于整个人文主义哲学、心理学以及艺术等各个方面。这就促使语言学方法成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在后现代视野中全新的融合点和生长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把语言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深嵌后现代特性的“整体论观念”为前提，构成了他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语言学方法。

范·弗拉森在“拯救现象”的过程中，看到句法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所存在的“战略性”的缺陷而直接走向了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构造和设定。从总体上讲，其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整体论与非决定论、概率论的统一。范·弗拉森在考察、分析量子理论时发现，整体性观念与非决定论、概率论是相一致的。部分状态对整体状态的非决定性恰恰体现了整体观念的内在性，而非决定性则与概率论是直接相关的，因

此,整体观念必然地体现在概率论中。

②语义分析方法的优先性与必要性。在范·弗拉森看来,当我们研究、阐释和构造理论的逻辑模型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技术误差。而运用语义学方法则会比公理化方法有着更广阔的分析空间”。^[3]因此,范·弗拉森更倾向于强调语义分析在理论解释、评价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③自然主义语言是范·弗拉森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核心。范·弗拉森吸取了奎因的自然主义,以整体论为其原则基础,强调构造整体的自然语言的适当模型,从而形成了以自然主义语言为核心的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

显然,在范·弗拉森构建以自然主义语言为核心的后现代整体语义分析方法的过程中,事实上已蕴含了其方法论走向语用分析的基本生长点。从总体上讲,其后现代语用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语用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整体论性和实践性。范·弗拉森主张语用分析不仅可以给出一种有理由的语言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通过将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实用”结合起来这条途径,由经验的适当性走向了对理性权威的消解和批判,从而体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

②语用分析是以语境为基底的公共实践方法。在范·弗拉森看来,语用分析在本质上是一个揭示语境本质的过程。正是“语境”这一基底,消除了纯语言形式的束缚,从而在经验的意义,范·弗拉森以语形、语义、语用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整体形式,走向了他所构建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现象学方法。

(二)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是一个以意向运动为框架,以超越语言形式的约束为方式,以具体的还原方法为核心,以重建和贯彻本质的意义理论为目的的唯理主义的哲学体系。但是,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不仅仅是作为本体论而存在的,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存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范·弗拉森正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这个角度来实现其方法论的后现代演变的。而他之所以在语言学方法之后转而经由现象学方法的途径去解释和构造科学模型,则是由20世纪语言学发展中自身所具有的限制性以及现象学方法的内在特点和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范·弗拉森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时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者过分地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而走向了极端。事实上,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自身必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正是语言自身所具有的这些局限性,使得范·弗拉森不得不转换视角,重新寻求一种超越语言形式的研究方法。

其次,现象学方法的本质特性恰恰适应了范·弗拉森构造科学理论模型的需求。现象学在其本质上来说,它是反传统的。随着现象学的扩张,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和方法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在大陆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中。范·弗拉森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趋势,因而试图把现象学方法培植成重解哲学的手段和途径。

以上这些因素,促成了范·弗拉森避开语言形式的束缚,而转向了“超越语言形式”的现象学方法。

后现代“语用”概念突破了把科学语言仅仅看作是对理论与世界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描述,而强调了理论、世界与使用者之间的多元关联。这标示出后现代性的多元化以及科学研究中心意向性的不可或缺地位。因此,这一语用化的要求使范·弗拉森提出,要在语言的语用分析层面来研究现象学方法,以使“科学的现象学能够适当地在语言的语用分析中进行探讨”^[4]。可见,范·弗拉森的现象学是建立在语用分析之上,具有较强后现代特性的方法。其后现代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①语用构成了现象学方法的基底。范·弗拉森力求在整体论特性上,在语用的基底上,去实现语用分析与现象学的统一,为方法论的重新建构寻找到了合理存在方式,从而在语用结构自身中去把握更深层的意向功能,以探索普遍的科学理论模型。

②语用现象学是以经验为基底同时又超越经验的方法。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始终强调把经验作为其理论基底。但是,另一方面,“单纯的经验描述是有限的。”^[5]所以,只有使经验的适当性与它对现象的超越成为一致的和必然的,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从而最终拯救现象。

③心理意向分析是语用现象学方法的根本特征。范·弗拉森强调特定的科学事实“可能包括心理状态的部分,因为这些部分涉及到对理论的沉思”^[6]。同时,语言的意向态度是与意向运动密切相关并在这一运动中获得实现的。因此,只有在意向运动中,语言才能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致性上与具体的指称物联为一体,从而展示语言对意向经验的描述。

范·弗拉森的语用现象学方法正是以经验为基础,在语用基底上,实现了其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语用现象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沉迷于对直观和绝对给予物的追求。因此,范·弗拉森为了避免后现代语用现象学方法所带来的缺陷,最终走向了全新意义上的解释学方法。

(三)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解释学方法——“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方法

后现代“语境”概念与语用分析方法的广泛渗透,为解释学方法脱离狭隘的思辨域面,进入一个广阔的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关的新视界开辟了可能空间。正是从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他把句法的形式结构的分析、本文的深层语义的结构分析以及对语言的使用和使用者在语境基底上结合起来,强化了解释学方法的整体性、相关性和一致性,促成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多样性,同时也推进了整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可能趋势,从而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实现其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解释学的建构。在这一建构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他所选择的通向解释学方法之路,包含了走向语用分析和“语境化”建构趋势的基本生长点,从根本上说,其反实在论的“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的后现代特性就在于:

①满足了从全新视角对传统“解释循环”难题进行重新解释的迫切要求。范·弗拉森站在“语境化”基底上的语用解

释学方法的立场,“将浸入科学语言或科学世界图景的这类概念置于语用空间当中”^[7],从而在语用与语境结构的趋同中实现解释者与本文之间、解释者之间的对话,以最终获得完整的意义。这样一来,“解释循环”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便得以适当地求解。

②“隐变量解释”(h. v. interpretation)是“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方法的典型内容,它提供了适当阐释量子力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在范·弗拉森看来,“要进行解释就必须引入‘隐变量’”。^[8]同时,“一个适当的解释必须是具有‘经验多余性’(empirically superfluous)的隐变量的隐变量解释”。^[9]这样,“隐变量解释”就为量子力学理论的全面展开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分析的视角。

③体现了解释学方法的实践定向。范·弗拉森从后现代视角出发,强化了解释实践与解释理论的相关性,保持了解释实践与科学行为的一致性,同时也强了解释实践与背景语境的统一性。因此,从这个意义说,范·弗拉森所构建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解释学方法是建立在实践之上同时又构成实践自身的。

总之,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是构建在经验基础之上,以语境为基底,使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方法论。它冲破了传统方法论的桎梏,弱化了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了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了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

四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真理观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宣布“认识论的死亡”时,范·弗拉森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将“认识论的死亡仅仅看作是长生鸟再生之火”^[10],开始重解其真理观,实现了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后现代“圆融”。

(一)真理概念的合法替代

随着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口号的广泛渗透以及20世纪初整个科学哲学领域对当代语言哲学问题的全面介入,科学哲学家们理智地改变了对真理问题论证的策略,开始以语言为契机寻找对策,从而试图在语言范围内消解哲学难题。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范·弗拉森既对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同时,他又反对其他反实在论从根本上否定真理性的存在,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其反实在论特征的真理概念以代替传统的真理概念,即“经验适当性”。

“经验适当性”的提出,不仅适应了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的现象的要求,而且成为在逻辑上独立于真理的科学成功标准。可见,范·弗拉森的真理观与科学实在论的分歧并不在于对科学语言的本义诠释以及对科学理论含义的理解上,而仅仅在于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因此,他得出结论:科学的“成功标准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真理,而只是实际的和可观察的事实”。^[11]在这里,范·弗拉森从理论的整体建构意义上,否认了理论模型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具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联,从而强化了经验适当性的合理有效性。

不言而喻,经验适当性的提出,标志着二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的解构,同时也喻示了真理观在语言哲学范围内后现代趋向的又一次崛起。正是在这一真理概念的重新构建的过程中,范·弗拉森走向了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而这条通向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之路又蕴含了其反实在论真理观走向语用对话和“语境化”的解释学真理观的基本生长点。

(二)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

自然主义作为后现代发展趋向上一股强大的洪流,也浸透了整个科学哲学领域,并获得了某种全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它还将整个哲学与科学的、语言的、实践的、历史的自然化趋势关联起来,以自然主义为轴心实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进而在自然主义的基底上,推动了科学哲学向后现代转变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范·弗拉森在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建构中引入了自然主义,突出强调推进自然语言分析,将真理看作是语义范围内的概念。因此,“经验适当性”作为真理概念的特定表述,通过测量的经验性或可观察性被自然地表达出来,从而使得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真理性直接当下地与测量主体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境遇相关联,最终将真理建构于自然主义的基底之上。

范·弗拉森在推进其构造经验论真理观的自然化重建的过程中,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途径无疑是其自然主义真理观得以全面展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同时,这一过程本身也恰恰包含了语义分析已替代逻辑句法分析而成为其构造经验论的主要方法论基底。另一方面,“后现代”语义学的语言观的确立,为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建构提供了新的世界图景,打破了传统语义学那种认为语词的意义先于语词的指称,意义先在于任何关于对象和命题的真假判断的看法,从而试图在语义学的基础上,摧毁基础主义的哲学大厦,并为解构传统真理符合论奠定了可能的基石。正是基于这一点,范·弗拉森形成了其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从总体上讲,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由“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变为“非确定性”的“经验适当性”的真理概念,为构造经验主义哲学奠了解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基础。

第二,把真理观看作是一种“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为其真理概念走向公共实践和生活实践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其反实在论真理观走向语用对话提供了基础。

第三,范·弗拉森将完美的(complete)语义结构看作是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一种障碍,正是基于对这一障碍的消解,提供了其向“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转变的动力。

(三)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

继“解释学转向”之后的“修辞学转向”使得修辞学不可避免地引入了科学哲学的广阔领域。它作为解释学的一种变形,将科学论述看作是境遇论述,要求在“语境”的基底上,以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去整合阐释真理问题的基础,从而强化了理论表述的实践的、历史的和整体的统一;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其典型的口号

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2]。因此,真理问题在后现代的大环境下,不仅要以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为基础,而且要把语境作为主体为了达到人类交流的现实目的而自然存在的一种认知方式,作为基底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真理观实现了后现代的“圆融”,走向了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其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适应了其哲学方法论的建构要求。随着后现代整体论观念的广泛渗透,使得当其哲学方法论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而最终走向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解释学方法以及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语言学方法的同时,其真理观也加速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进程,开始在语境基底上,建构其真理观。这样一来,其真理观就满足了其后现代方法论建构的要求。

第二,将语用学看作是逻辑分析的基础,为进一步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真理观,摧毁基础主义大厦提供了理论基石。范·弗拉森一反传统常规,认为“真值概念的可应用性是所有逻辑分析的基础”^[13]。换句话说,逻辑分析既是逻辑起点,又是超越自身之外的东西;同样,语言的使用既依赖于逻辑句法分析,同时又可以作为逻辑句法分析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实现了由经验的适当性去拯救现象的目的。

第三,真理问题的语境化是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走向在其科学哲学中的具体化。范·弗拉森把语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显示出强烈的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同时,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语境又作为一种具有经验适当性的概念突现出来,成为其构造经验论的一个经验基底和一种展示其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

第四,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真理观实现了其整个构造经验论的后现代“圆融”,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后现代趋向。

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范·弗拉森所构建的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论,仅仅是真理研究中的一种趋向或态势,它并不具有任何特权地位。它仅仅意味着,在“语境化”的意义上,真理已不再是代表哲学旨趣的终极主题,从而为消解传统形而上学难题提供了可选择的手段和途径。

五 结束语

通过对范·弗拉森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总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范·弗拉森在 20 世纪哲学发展的进程中,试图以构造经验论这一反实在论哲学思想来推进哲学的转向,从而摆脱传统经验主义和传统实在论所崇尚的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束缚,最终为哲学营造一个以语境为基底,以整体性为特征,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化空间。这对于科学实在论在较成熟的基点上迈开其发展的步伐,对于批判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片面性并促进二者的合流,都具有其富于启迪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具有鲜明的兼容性。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是在库恩和劳丹之后形成的,因此必然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同时,科学实在论在 20 世纪的全方位复兴也为他的反实在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因素。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范·弗拉森既保留了以往反实在论尤其是历史主义在新的发展进程中的合理方面,又对一些科学实在论者对实在论的辩护加以分析,最终形成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反实在论。这一理论的论证是有理由的、合理的,它影响了大多数科学实在论哲学家,在它的影响下,一些典型的科学实在论者纷纷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普特南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内在实在论”。可见,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观点标志着历史主义、反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争论的新阶段。

其次,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加速了后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进程。他始终强调科学理论的建构经验论的特征和开放性特征,将理论看作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克服了以往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局限性,将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相融合;同时,随着 20 世纪初“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修辞学转向”的广泛深入,他将语言分析作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中介桥梁,不仅克服了二者的片面性并进一步推动了二者的合流,而且消除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截然对立的情绪,从而在科学实践的基底上使二者并重。因此,从本质上讲,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哲学思想适应了后现代大融合的趋势,成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某种时代的映射,它预示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①整体性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的结合。②语用分析与语境实践、语境分析与各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之间内在的关联和同一。③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但事实上,这种趋向并不等同于后现代状况中某种具体且有形的形态,同时,它也绝非后现代文化中的某一特定的流派,它仅仅是科学哲学的一种“研究战略”,而非固定不变的范式或教条,范·弗拉森之所以构建具有后现代特性的反实在论,正是为了把握整个科学哲学发展与进步的时代特征。

当然,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并非完美无缺,它本身所具有的折衷性是不容忽视的;另外,范·弗拉森在拒斥基础主义的同时,又将可观察性作为其理论的基础,这也是他不可解决的一个悖论。所以,建构经验论仅仅可以作为科学实在论的一个重要启发纲领,而不可能像范·弗拉森所声称的那样成为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全面替代纲领。

无论如何,从后现代性特征与方法论、真理观的转向以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等各个方面去全面深入地研究范·弗拉森的哲学思想,从而揭示反实在论研究中的“后现代趋向”的本质,对于把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甚而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并在整个历史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语境中促进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合流,最终将整个科学哲学的研究全面推向 21 世纪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9.
- [2]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9.
- [3] 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302.
- [4]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3.
- [5]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9.
- [6]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8.
- [7]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91.

- [8] 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243.
- [9] 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243.
- [10] 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47.
- [11] Bas c. Van Fraassen, *Laws and Symm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3.
- [12] Steven Seidman and David G.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 6.
- [13]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3.

(责任编辑 魏屹东)

(上接第 39 页)科学总是意味着对不可回避之物的某种程度的解蔽,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当人们把科学的解蔽看成是独一无二的时候,它就驱除了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科学在解蔽的同时就成了一种遮蔽。因此,海德格尔说:“一切存在者一向于其中显示自身的那种无蔽状态都蕴涵着危险,即:人在无蔽领域那里会看错了,会误解了无蔽领域。于是,在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描述一切存在者的地方,甚至上帝也可能对表象而言丧失了一切神圣性和崇高性,也可能丧失了它的遥远的神秘性。”^[1](P944)可见,杀死“上帝”(这里的“上帝”不应该理解为宗教神学上的上帝,而应该理解为人类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人们对科学的无知和迷信。实证主义的盛行把人们对科学的这种无知和迷信表露无遗,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于,人们甚至把克服实证主义的希望也寄托于实证主义。

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在于科学对不可回避之物的解蔽总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解蔽,即它总是把不可回避之物解蔽为持存物或存货。一旦无蔽领域甚至不再作为对象,而是唯一地作为持存物与人相关涉,而人成为单纯的持存物的订造者,那么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在那里人本身也被看作持存物。但受到如此威胁的人却浑然不知其危险的处境而神气活现地以地球的主人自居。“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感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

而已。”^[1](P945)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原因,那么这句话就是“科学不沉思”。^[2](P8)当然,如果沉思仅仅意味着对某物的表象,那么,科学也沉思。但真正的沉思决不仅仅是对某物的表象,因为“沉思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Sinn)。”^[1](P976)沉思要求我们摆脱科学理性的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学会用现象学的方法“面对事实本身”,以认识事物在人的技术利用目的之外的自在本性。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技术时代,是一个贫困而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贫困和黑暗之处在于:人们已经被科学分析理性和技术利用意志蒙蔽了双眼,完全看不到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存在者的天性了。海德格尔认为,在这样一个黑暗而贫困的时代,唯有一流的思者或诗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对时代偶像的顶礼膜拜中解脱出来,使我们重新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参 考 文 献】

- [1]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 [2]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M]. New York: Harp and Row, 1968.

(责任编辑 殷杰)